

赫 尔 岑

农 林

外国历史小丛书

商务印书馆



K109

26

.2



2 035 8482 5

业
群

02/100/H6

外国历史小丛书

赫 尔 岑

农 林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外国历史小丛书
赫 尔 岑
农 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³/₄。印张 20 千字

1980年4月第2版 1980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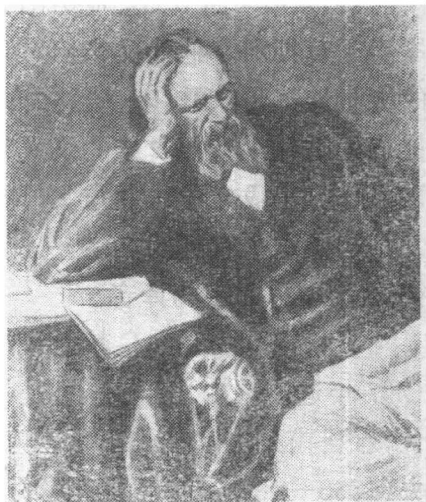
印数：9,700 册

统一书号：11017·185 定价：0.12 元

目 录

- 一 青年时代2
- 二 来自生活的学术思想和创作活动6
- 三 艰苦的思想劳动.....15
- 四 为爱国寻求出路.....19
- 五 创办自由俄罗斯印刷所 编印《北极星》和
《钟声》.....23
- 六 看到了革命的民众.....28
- 七 永远向前.....36

赫尔岑(1812—1870年)是十九世纪俄国解放运动时期的杰出人物,是从自由派贵族走向革命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的激进的政治言论、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和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不仅对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赫 尔 岑

早在六十多年前,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列宁就这样教导我们: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应该以他为榜样,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并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革命者;应该从他的一生活动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一 青年时代

1812年4月6日，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伊·阿·雅科甫列夫是俄国的大贵族；母亲露莎·哈格却是德籍的女佣人。由于他们的婚礼没有照贵族的仪式举行，所以赫尔岑一向被看作养子或义子，并与父母的姓氏不一致。父母给儿子起了这个有趣的名字——赫尔岑(Герцен)，原是德文(Herz)心字的译音。

雅科甫列夫是沙皇禁卫军的上尉，1788年服役，1797年退職。官职不高，可是早在叶卡德琳娜女皇时代，雅科甫列夫家就积下了巨万家财；赫尔岑的伯父列夫(1763—1839年)是参政院的外交官，他们弟兄一直没有分家。所以他们不仅在首都有一座非常豪华的府邸[двор]；而且在莫斯科近郊——瓦西里耶斯科耶村还有个风景幽美的庄园。

赫尔岑生长在这个大贵族地主的家庭里，受到父母和伯父的宠爱。他没有年岁相近的同伴，每天不是在他父亲的书库中阅读那无比丰富的藏书，就是偷偷地跑到农奴的家里去，同他们聊天。家中给他请来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是法国人，年老的布梭。他是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见证人和参加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党的成员，他不遗余力地给赫尔岑灌输自由民主的思想。他称赞赫尔岑，说赫尔岑有着非常高尚的情操。他曾经对赫尔岑说，法国人民决定把勾结外敌、叛卖祖国的专制暴君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如果他当时还在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国民议会中的话，他一定也赞成这个判决。另一位教师是年轻的普罗托波波夫，他是医科大学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诗歌爱好者。他经常把当时视为违禁品的政治诗抄给赫尔岑看或者给他背诵。赫尔岑的堂兄阿列克赛，是一个醉心于化学研究的人，笃信无神论和唯物论，而且善于诱发赫尔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赫尔岑的亲戚库庆娜，是一个热情充沛而又博学的年轻姑娘。她来赫尔岑家里长期作客时，经常给赫尔岑讲述古希腊罗马的英雄故事，勉励赫尔岑，预言他将有非凡的前途与荣誉。赫尔岑说：“她支持了我心中的政治理想。”当库庆娜离开雅科甫列夫家时，赫尔岑曾写信给她：“又是孤独，又是书本，只有书本作我的伴侣。”

赫尔岑出生的那一年(1812年)，正是俄国人民击败拿破仑的一年。在以后的几年中，俄国到处盛传着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如波罗金诺大会战、莫斯科大火、别列济纳河战役和攻陷巴黎等等。在赫尔岑家中，甚

至从保姆和农奴们的口中，也可以听到这些传说。这些英雄故事，成了赫尔岑的“摇篮曲”和“童话”。

卫国战争的胜利，显示出俄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和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可是，俄国仍是一个被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束缚着的国家。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妨碍着进步力量的发展；广大人民，特别是农奴，还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俄国各地连年不断地发生农民骚动。1825年，年轻的十二月党人，在首都彼得堡的国务院广场举行了公开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它却成为俄国解放运动的序幕。

1826年7月13日，十二月党人五个最杰出的领袖佩斯特尔、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杜日夫·留明、卡霍夫斯基和雷列耶夫被绞死于彼得罗巴甫洛夫塞堡的城墙外，先前与他们一同被提交法庭审判的五百七十九人也被充军边地或从事长期的苦役去了。赫尔岑说，这些自觉地赴汤蹈火的战士，是从头到脚都用纯钢炼成的英雄；这次流血事件，唤醒了他心中天真的梦想，第一次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在他看来，这次国务院广场上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十二月党人脱离人民，而要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就必须先唤醒人民。

早在 1825 年夏天，赫尔岑就和奥加辽夫相识了。共同的信仰（即对自由的渴望）、对农奴制的憎恨和对十二月党人的崇敬，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826 年，他们曾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起过誓，决定献身于他们所选定的斗争。这一誓言，成了他们革命生活的序曲。当时，赫尔岑只有十四岁。

1829 年秋，赫尔岑进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第二年，奥加辽夫也来了。大学中有着比较自由的政治空气，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沙仲诺夫自愿地结成一个政治小组，经常谈论着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例如 1830 年的法国革命，1831 年的波兰起义。他们互相交换“禁书”或起义领袖们的肖像，揭露自己庄园中或社会上种种出于专制暴政的罪行，宣传共和政体或民主立宪的思想。他们自称是十二月党人的儿子，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门徒。他们这个小组，成了莫斯科大学中宣传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组织。

赫尔岑的学习成绩很好，这—是因为他从小就有比较丰富的书本知识和生活知识；二是因为进了大学以后，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步。他检查各种理论的正确程度，总要把它们拿来和实际情况相比较，不仅从书本上，而且从实际生活中寻求问题的答案。

赫尔岑虽然是数理科的学生，他刻苦钻研的却是整个自然科学，而且还有余力研究各种社会科学。他说：“科学并不把我们从周围困扰的生活中引开”，可见他所最关心的还是俄国的政治。

当时，莫斯科大学中的革命派特别热中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是政府为了掩盖封建农奴制的实质，替反动的剥削制度涂脂抹粉，就指定瓦西列夫教授来主讲庸俗而反动的政治经济学。赫尔岑说，他并没有接受瓦西列夫的观点，却从瓦西列夫的教学大纲中逐步地熟悉了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1833年7月，赫尔岑毕业了。他写了《哥白尼太阳学说的分析》的毕业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和银质奖章。

二 来自生活的学术思想 和创作活动

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仍然和政治小组的几个同学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鉴于当时的杂志是思想斗争的主要阵地，进步的杂志是先进社会思想和各种知识的传播者，是向反动的农奴制作斗争的锐利的武器，因此他们积极筹备出版一种综合性的大型

杂志。可是正当这个时候(1834年7月),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谁也弄不清。有的说是因为有人向官府告密,说他们在一次秘密的集会上高唱革命歌曲;有的说是因为他们乱发议论,违犯了官府的禁令。至于官方,那就随便给他们扣上一些罪名,说赫尔岑是“一个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说奥加辽夫是“一个危险而诡秘的狂热之徒”。

由于政府始终无法获得确凿〔zuó〕的罪证,所以对这些贵族中的自由思想者只能采取流放的办法。从1835年起,赫尔岑先后被流放至比尔姆省和维亚特加省。在维亚特加省时,省长梯菲亚也夫命令赫尔岑在自己的办公厅里做事,当翻译,编《维亚特加新闻》,随后又委派他担任统计员。统计委员会主席也认为赫尔岑精通这方面的业务。可是赫尔岑不是真正在为官府办事,他认真工作,只是为了寻找最精确的数字,用来说明农奴制度的罪恶,证明农奴的无权与贫困。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从前,他只是在自己的地主庄园中目击或从间接传闻中了解农民或官场的情况;现在,几年的流放生活,使他能从最现实的问题,例如租役、法制等等,深入地理解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从而确立了他的民主主义观点。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克契尔说:“阁下,你并不认识俄国,

因为你住在它的中部；而关于它，我却认识了许多，因为我住在维亚特加。你的综合思想的大部分是以书本为根据的；我从书本上得来的想法虽然不多，但我却从最现实的问题和法律上的事实来确定它们。”

本来，1840年赫尔岑就被释放了，可是1841年，因为沙皇特务截获了他给父亲的一封信，信内愤愤不平地指责彼得堡警察非法枪杀路人，所以又被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去。直到1842年夏，他才回到莫斯科。

从1842年7月到1847年1月，赫尔岑在莫斯科的四年半的生活，过得很有意义。他从事着紧张的创作活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果。他接连不断地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这两个最进步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政治论文、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

赫尔岑发表哲学论文，是为了摇撼〔hàn〕农奴制的思想基础，把广大的人民吸引到破坏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斗争中来。

专制制度的统治者和农奴制的辩护者总是把俄国民族看作仿佛从来便是笃信正教，效忠沙皇，甘于忍耐，不想反抗的，他们常用农奴制能增进农奴福利等花言巧语来愚弄人民。而当时的哲学界正流行着一种脱离实际的、华而不实的作风。他们只是抽象地侈谈黑格尔，并不揭发黑格尔企图向现实妥协的政治主张，这

正是符合当时俄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甚至连一些最先进的人士如别林斯基等,也受到黑格尔学说的迷惑。赫尔岑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认为哲学研究如果跌进这个圈套便一无出路,不能完成其破坏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所以他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1843年发表)和《自然界通讯》(1845—1848年发表)等一系列著名的论文中,反复地发挥了“必须战胜黑格尔、发展黑格尔的原理”的思想。

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人,是一个非常渊博的哲学家。但这位哲学家从他对于现实世界的种种探索中引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当时俄国的“哲学家们”把这一结论看作真理,象崇奉神明一样,凡遇到批评现实、反对现实的言论,都斥为狂妄之谈。他们甚至拿黑格尔来吓唬人,说人家没有“好好读过黑格尔的作品就胡乱来批评现实”;预言这些“冒冒失失地反对现实”的人,一定会被现实“压得粉碎”。有人还这样说:“我们要希望新的一代最后能习惯于我们美丽的俄国现实”,即习惯于尼古拉时代的现实。与这些“哲学家”相反,赫尔岑却认为黑格尔的这个结论,乃是一派谎言。因为笼统地承认现实的合理,就意味着鼓吹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黑暗面妥协。他说:对!我们应当承认现实的事物,但

不能把一切偶然的、日常的、衰颓的，把这一切从街头巷尾遇到的无论什么，都称之为现实的、从而也就是合理的事物。比如说，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是现实的，但这种关系却是不合理的。“问问他们，如果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话，那么如何解释曼彻斯特和伯明翰^①的劳动者竟因饥饿而死？”赫尔岑往往用这些最现实的问题来反诘[jié]黑格尔及其信徒们，从而揭露了他们学说的唯心主义本质。

赫尔岑也看到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他把这个正确表明事物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法看作“革命的代数学”，看作反对旧制度的“强大撞击器”。

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进步的、革命的因素，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却是保守的、反动的。赫尔岑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通过深入的研究，发现黑格尔学说中这一主要的矛盾。他说：“黑格尔常常把原理探索出来，而不敢承认原理的一切结果。他寻找的不是简单明了的、自然的、当然可以得出的结论，而还是为了使它跟现有的结论相安无事。”这样，他就走到黑格尔的前面了。

赫尔岑还研究了费尔巴哈（1804—1872年）的哲

^① 是英国的两个大工业城市。

学。费尔巴哈也是德国人，是黑格爾的学生。黑格爾的信徒分成了左右兩派，费尔巴哈原属左派；后来因为他尖锐地批评黑格爾的唯心主义而转到唯物主义的立场，成为德国的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赫尔岑一看到费尔巴哈的著作，就感到非常兴奋。他说当代的学者，只有费尔巴哈能剥去哲学上一切虚假的外衣，将真理赤裸裸地揭示出来。费尔巴哈说，黑格爾关于意识第一性的学说，不过是一种被改装了的上帝创世说罢了。可是当赫尔岑对费尔巴哈的学说作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则又不同意费尔巴哈那种认为一切都由人来决定，同时又把人归结为自然人的见解。

赫尔岑虽然没有彻底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毕竟还是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因为他坚持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认定人类的一切思想意识都来源于物质。

不仅如此，赫尔岑的唯物主义哲学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直接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的战斗传统，在与农奴制的斗争中武装了战士们的思想，打破了人们对正教、皇权的迷信，从而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赫尔岑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是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最好的武器。在满布沙皇鹰犬的文化阵

地上，革命家没有言论自由；而文学作品却可以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来揭发社会的黑暗，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文学作品可以运用巧妙的词藻把深刻的思想装饰起来，而果敢的革命思想就能象大力的昆虫冲破纤细的蜘蛛网一样，冲破官方书报审查的防线。

赫尔岑的文学观点，是在系统地研究西欧文学史和继承俄国文学战斗传统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他在《华而不实的浪漫主义者》一文中，在批评俄国文学现象的一切言论中，肯定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几部文学作品，说明他正沿着普希金和果戈理所开拓〔tuò〕的道路前进。

《谁之罪》是赫尔岑流放诺夫哥罗德时就已动笔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来到地主涅格洛夫家，担任他儿子米沙的教师，爱上了他的女儿柳邦卡。这事引起了涅格洛夫年轻妻子的嫉妒。涅格洛夫把克鲁采弗尔斯基看作心腹之患，于是顺水推舟，让这对青年男女结合了，并且在城里替克鲁采弗尔斯基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业。下篇却从另外一个故事开始，叙述贵族青年别尔托夫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思想，然后转到与克鲁采弗尔斯基一家的认识，爱上了柳邦卡，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幸福，造成了社会性的悲剧。

柳邦卡是涅格洛夫同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这女孩一生下来，她的母亲便被迫害死去。柳邦卡在地主家庭中所处的屈辱地位，既使她从心底里讨厌地主而喜欢农民，又使她思索许多享福者直到进棺材时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她真心地爱着克鲁采弗尔斯基，但她又仿佛觉得另有一种东西是克鲁采弗尔斯基身上所没有，而只有在别尔托夫身上才能找到的。她感到别尔托夫有火一般的活动的性格，能给她的心展开一个新的世界，产生新的思想和感情。别尔托夫也觉得柳邦卡身上有着一种非凡的力量，觉得他遇到这样一个惊人的女性，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至于克鲁采弗尔斯基，在热恋着柳邦卡的时候，他曾经把一切——如对父母的爱，对学问的喜好，都放在恋爱之下了。因此，当柳邦卡忍受着精神折磨的时候，他自己也被忧伤压抑着，成天祷告上帝，或借酒浇愁。别尔托夫破坏了别人的幸福，自己也非常颓丧，由于苦闷，终于再度出国旅行了。

谁不承认这些人是有造就的青年呢！可是他们的意志和精力却被这很难幸免的人生悲剧断送了。这是一种莫大的罪过。谁的罪过呢？作者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